

經濟景氣研究

張果爲

——憶中國文化大學十年教學生涯

歸國從政及教學生涯

我來台後的教學生涯，自民國三十八年春開始，在台灣大學經濟系講授財政學及統計學兩門課程，嗣後以某些關係放下我最有興趣的財政學不教，而專教兩門統計（初、高統計兩門），直至民國六十一年以年屆七十申請退休，計共教了二十四年。然而當時眼不昏花，精力不衰竭，退而不必休，且因生計關係，退亦不能休，乃於六十六年七月應中國文化學院今改稱中國文化大學之聘，任專任教授兼經濟學研究所主任——迄今已十週年了。然而本人教學生涯早在民國十九年初，自德國留學歸國——擔任東北交通委員會統計科長時——即在東北大學北關夜校兼任財政、統計兩課。九一八事變後基於愛國熱忱一度參加遼北義勇軍。瞻榆失守後，離開義勇軍往廈門大學任教一年，轉入福建省政府服務，由福建而往中央服務，一度接受重慶大學教授聘書，但只教了一課，因公忙而未繼續教下去。在台大任教期間，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擔任一年又半年客座教授，又在西德波昂大學擔任一學期客座教授（教經濟發展——台灣實例及抽樣統計兩課），綜計迄今共擔任教職三十餘年。民國六十八年秋

獲教育部頒贈連續從事教學工作屆滿卅年的八德金質獎章，這是論年資的獎勵，不是考績的結果，也無頒獎的任何儀式，只是默默的送到你手中。教學工作是安靜的，頒獎是默默無聲的，然而國際諾貝爾獎是學術成功獎，是需經過論文嚴格的審查，不是論年資的，是要有特殊成就方能得到，得到那種獎方算殊榮，教育部頒的八德獎，不過是一種勞績的證明，然而就本人言，則算一種榮耀。本人一生的光陰，留德回國以後——五分之一的歲月服務於政府機關。在福建開始做「官」，建立統計基礎，整頓全省稅務，建立省財政根基，自問不能說毫無成就，然而結果落得是被排擠而悄然離開轉到中央服務。抗戰勝利後，奉命主持華北財政金融復員，初期重慶與華北無法交通，所有中央規定，在貨幣復員方面，概屬窒礙難行，而國軍未能迅速到達，平津外圍共謀潛伏，維持治安端賴偽警憲，平津市內如起金融風潮，則可釀成巨變，這正是共黨所策動及所圖謀的一種風潮，身為特派員所負的責任何等的大，幸而費盡心思，兩度化解金融危機，得告平安無事，然而以偽伍仟元券之行使，這在化解金融危機上不能不有的緊急措施，致遭糾舉，彈劾，終至停止任用五年。一般眼光來看，本人之服

官結果，遠不如從事教學工作，蓋後者獲有「八德獎章」，而前者則為「五年停用」。後者是一種榮譽，前者是一種羞辱。但是私心並不那麼想，在事業的成就與影響，後者雖然幫助一些青年人學了一點知識，然而造就一個學生並非某一教授而是全體教授，個人之功勞有限，個人的影響也不大，這不是說像孔孟一類的大師立言影響萬世，乃是說一個普通教授——並非造育大師——能算什麼呢？然而做官若能有重大成就，若有重大改革造福人羣，做官若能捍衛國家，或為民族成仁取義，則其功業永垂萬古，當時若以奸佞而遭罷黜，或以冤獄喪生，然而保守民族正氣，發揚忠義精神，在歷史上輝煌彪炳，豈非殊榮？以本人的做官經歷，一則悄然離職，一則停止任用！當時不免因不明真相，議論紛紛，但事實勝於雄辯，縱然蒙冤於某一方面，未必不為社會所明察，縱然遭謗於一時，終必大白於後世？所以做官者欲建功立業，必須置榮辱生於度外，而以國家存亡民族盛衰為己念，否則為「官」而做「官」，誤國誤民，終成鄉愿之輩，徒遺萬年而已。

經研所景氣預測研究

文化大學經濟研究所的課程與台大、政大、東吳、中興等經研所的課程計劃，大體相似，最

主要的為高等經濟理論、數量方法、計量經濟學、貨幣與財政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與國際經濟學、台灣經濟問題研究等。文化經研所成立已廿年，第一任所長為王作榮先生，繼之為王撫洲先生與陸民仁先生，最近十年由我主持，以他們三位的卓越才學為經研所建立了良好基礎與研究風氣，本人在他們樹立的根基上，明定了一個教育方針，就是經研所碩士班應重在應用，不求過高理論，例如計量經濟學，不開第二班，但開一總體計量模型的研究及經濟學方法論的選科，並開有電腦原理與應用。依照這個方針，以經濟預測（含經濟循環）為核心，不但開專門課程，並極力引導研究生寫這方面的論文。由是使我們的全部課程，均以經濟預測為核心。

經濟景氣預測的研究，本人早在柏林大學讀書時（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以生活費用無着——得在柏林景氣研究所擔任統計員，即跟隨該所所長 Prof. E. Wagemann 一面在所中作統計分析，同時在大學研讀，他並為我的博士論文導師，因而得窺這門學問的門徑。當時這方面的研究，以哈佛三指標（Harvard three Barometers）為最盛行，短期預測亦屢見奇效，惟至一九二〇年代末已失靈驗。在哈佛三指標出現以前，一般循環研究，大都傾向於一個總指標的尋求，以代表循環的變動，然而 Prof. E. Wagemann 則自諸多經濟變數結構若干分類指標，使成爲平行關係，或爲相反關係，或爲束縛關係，自其相互演變的跡象，以明循環的發生。他的景氣理論（Konjunkturlehre）發表於一九二

九年，爲一時的名著。其書中亦論及哈佛的三指標爲德國用之於一九二〇年代亦有一時的預測力，然而未久即不靈了。

一九二九年間，世界經濟景氣危機潛伏暗滋，旋暴發於美國而延及全世界，多少銀行倒閉，多少工人失業，並由經濟大恐慌而激起政治的大變化、社會騷動；在德國則有希特勒起而執政，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亦大抬頭。如此經濟大災難，大西洋兩岸的經濟預測機構，竟無事前預見，使各國政府有所防範。當時我的老師 E. Wagemann，據他告訴我們，他曾感覺到，但以工作忙而未及以文字發表，他深表遺憾。經過此次失敗，大西洋兩岸的此種研究，一時銷聲匿跡，德國因希特勒當政，專制獨裁，任何學術研究均受打擊，景氣研究亦完全停止，然而經濟學人多認爲景氣循環未死，研究的人隨之增多。一九五〇年代西德慕尼黑經濟研究所創一種景氣測驗方法，完全作質的而非量的詢問，在產銷方面，他們所問的爲本月較上月增加、未變或減少，在價格方面，本月爲漲、不變或落。他們在景氣方面，問好壞或一樣，並且問半年以後的期待，由是而產生所謂營業氣候指標及存貨定單判斷諸指標，建立屬實資訊特別有效之統計。然而大西洋彼岸自哈佛晴雨計失靈後，繼之而起有國民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簡稱爲 NBER）的領先指標（Leading Indicator），更有美國（Wharton School）及德國波昂大學的總體模型預測，均爲世人所重視，誰謂經濟景氣預測爲已沒落而非重要的學問呢？

景氣預測的研究成果

我自德國回國後，轉入政府旋渦，加以九一八事變，奔走於義勇軍，無暇從事此一研究，直到執教於台大，方稍恢復，然亦不過寫過幾篇文章，此外如景氣測驗調查、景氣預測等工作，均以人力財力兩告缺乏，無法着手。直到轉入文化大學經研所服務後，方開「經濟預測」一課，不斷灌輸同學們景氣循環與預測的知識。每年要求研究生共同研撰「一年來經濟情勢之回顧與展望」一冊，此外並分頭尋請專家指導他們寫作有關碩士論文等——迄今約有十三篇：1. 許添財：「景氣測驗資料編制循環指標之研究」、「IFO 景氣測驗，一九七五——七六台灣景氣預測」、「景氣循環之研究——歷史本質與存在」（副教授升等論文）；2. 高凱聲：「台灣電力供需之研究」；3. 易茂台：「經濟循環與實證」；4. 吳榮貴：「台灣航業發展之研究」；5. 鍾福源：「七〇年代台灣經濟景氣變動之研究」；6. 徐純慧：「台灣景氣指標系統之研究」；7. 陳秋鋤：「台灣房屋建築循環之研究」；8. 陳登源：「台灣經濟政策最適控制模型之建立與應用」；9. 柯輝芳：「景氣變動診斷指標之研究」（得中國經濟學會六十六年度全國碩士最佳論文獎）；10. 楊孟傑：「耐久消費財與景氣循環之研究」；11. 鄭逸霖：「對外貿易對國際經濟景氣變動影響之研究」；12. 郭照榮：「貨幣供給、物價膨脹與經濟成長」；13. 陳中興：「工資物價與失業率間關係之實證研究」。上列畢業論文有幾篇表面上與景氣預測無關，實則內含有預測的探索。文大經研所最近十年畢業研究生不及四十人（每年入學十人），而論文

約有三分之一屬於景氣循環與預測的問題。廿餘年來文大經研所門戶公開，研究生多來自校外公私立大學，本校畢業生反而並非多數，更可喜者，研究生許添財，在其求學研究期間，即自動自發看重 IFO 經濟研究所的屬實或趨勢調查方法。文大經研所舉辦這項調查首先於民國六十一年底由文大資助試作第一次試查，繼於六十三年下半年受經濟部委託（蒙當時行政院長今總統蔣經國先生轉交辦理）正式辦理具有相當規模之調查，雖適逢景氣衰落，該部認為發表方式不當，未能繼續辦理。但却準確預測到翌年春（民國六十四年）復甦之消息。至民國六十四年因吳永猛（現任文大經濟系主任）及國泰陳嘉音（文大經研所民國五十五年畢業生）兩先生之聯繫而得國泰信託蔡辰辰先生應允長期資助，開始舉辦，逐月發布經濟景氣測驗月報，迄今已六年，對台灣經濟景氣之轉折點預測，可說未見失誤。近更與台灣經濟研究所合作並有洪建全基金加入資助，擴大調查範圍，不但使調查資料，更具可靠性，並且也供作研究分析，發揮調查測驗的功用。可見此一知識，在文大經研所已逐漸推廣了。文大經研所不僅在學生畢業論文激勵此項研究，本人並帶同研究生以這些論文之核心理論，綜合探索，建立診斷預測方法或作台灣資料的實證分析，先後成立四篇論文：諸如接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的獎勵研究，以「台灣經濟景氣診斷」為題，發表於中山學術基金會六十八年集刊，此外則有三篇論文自六十八年至七十年相繼發表於中國經濟學會的年會：（一）張果為：景氣變動診斷指標系

統的建立與應用——台灣統計資料之分析實證；（二）張果為、柯輝芳：台灣近二十餘年成長循環的判斷與經濟景氣轉折點及時診斷法試析；（三）張果為、柯輝芳：經濟景氣整合診斷法之涵義及其預測轉折點之可行性。另有陳登源：台灣總體經濟展望——華岡台灣經濟年模型之應用（民國六十七年及六十八年兩度發表）。

經濟景氣整合診斷法

在此幾篇論文裏，吾人在指標系統中，不僅仿 ZBER 的領先與同時指標的做法，而且在領先指標中擴大範圍，引進國際（美、日）指標，及屬質的營業氣候（Business Climate）與定單判斷，新進定單及存貨判斷諸指標，是為適合我國經濟的要求及特有屬質資料的應用。再在中國經濟學會第二篇論文中，提出我們的經濟景氣整合診斷法，以為預測轉折點之用，蓋徒憑領先指標的綜合判斷，因為受統計資料的限制，其判斷係屬事後（ex post）的，而一般社會所最感興趣者乃當時的情況（status quo），故文大經研所除應用綜合領先指標，作客觀的統計判斷外，並主張利用儘速資訊及觀察各種政治社會情況，並參酌各方面的預測意見，對景氣轉折點之何時出現，作一及時診斷，稱為「經濟景氣整合（Integration）診斷法」。但景氣轉折之高峯與低谷，每相隔年餘至數年之久，若無中間階段的診斷，則預斷要停頓多少時候方能做一次，使注意景氣變動的人，在繁榮時不知何時轉向衰落，衰落時不知究將何時復甦，不免減少預測功能。因此正研究一種現狀診斷法（Status quo diagnosis

method），期能運用吾人所主張的整合診斷法（Integration Approach），作出景氣變動的及時判斷。要之此法乃從同時指標的逐月增加率，追踪考察，以增加率到達常態的迴折點為第一警示（first warning），以已往平均常態高度的四分之三點為高峯低谷的危險境界，而作為第二警示（second warning）。如此按月預報，使決策人士可察知高峯與低谷的來臨期間，然後可預作政策措施的準備，及時付諸實行，當可增加政策的實際效果，而免如已往的景氣政策，多成為明日黃花的失效。政策不但無效，而且不少火上加油的反影響。此為斑斑可考的歷史事實，無待吾人列舉贅述。若有及時診斷法，而能隨時（逐月）作現狀診斷，則可無此弊了。

由慕尼黑 IFO 經濟研究所發起有一國際經濟趨勢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conomic Tendency Surveys，簡稱 CIRET, Munich），現有三十餘國的景氣研究機構參加，筆者亦為該中心會員之一，該中心每兩年開會一次，文大經研所已參加三次，先後於民國六十六、六十八及七十年將我們景氣測驗調查所得經驗及我們對景氣預測的思想與方法，發表三篇論文於該中心年會：（1）張果為、許添財：Experience with Tendency Survey in Taiwan. （2）張果為：The synopsis of a proposed way of Judging the Turning Points area in a Business Cycle. （3）張果為、柯輝芳：An Integration Approach to the Business Cycle—The case of Taiwan。除第二篇因送到

（22）

稍遲，未列入議程外。第一篇在第十三屆國際會議中發表，使我國被列入世界從事「景氣趨勢調查」之林，在會中並有討論，無疑地為西德 I F O 景氣測驗方法在開發中國家之運用成效讚一言。第三篇並得國際名人如 G. H. Moore (美) 與 Dr. W. Strigel (德) 的評論，前者認為我們為台灣經濟成長循環與在景氣診斷指標方面開啓了一個好的開始，希望得到財力援助繼續努力完成所懷抱的理想，後者則贊賞我們在領先指標中納入國際景氣指標，又重視我們所提出的整合診斷法。此外文大經研所代表許添財先生於一九八一年 C I R E T 會中提出經濟趨勢調查資料的「加權」與「未加權」統計之比較，被列入大會結論第十四點，更表示文大經研所在景氣預測方法上之研究已有世界性之積極貢獻。該次年會主席確認我們的論文具有高品質而非常有興趣。

景氣循環與企業經營

景氣循環不僅為總體經濟一種現象，也為個體經濟方面一種需要研究的問題。所謂個體包括各行業或各重要產品，其或亦有循環現象。或可確定其景氣的領先指標，或可分析其發展受到一般景氣的如何影響。就主要產品言，毛豬是有循環的，國際糖價是有循環的，國際航運量也是有循環的。就行業言，房屋建築是有循環的，機械工業產銷是有循環的（文大經研所曾受輸出入銀行委託研究發現機械工業產銷有循環，並可建立其循環的領先指標），消費耐久財也可建立其循環的領先指標（文大經研所曾受財政部委託研究

發現），我們正想研究電子工業及其他各業的循環關係，借因人力、財力缺乏，進行緩慢。此外，任何行業、任何產業的產銷均必受一般景氣的影響，確定其景氣關係，對業者做營業決策，在財務、人工增減、購料、存貨等方面安排當有大幫助。一般的企業人士，不免一窩蜂，看見景氣甚好，力求增加生產，期望獲利，雖然利率高，而千方百計要貸款，雖人工缺乏，因增產要新進人工，要大批購料，也不怕存貨太多，但是一到繁榮高峯，景氣就要下降，今日的極力擴充，造成明日的負累。反之，在蕭條時期因產品銷售不暢，利潤不高，定單又一時較少，不斷收縮業務，減少生產，存貨已不多，還覺壓住財務太多，大家存著悲觀心理，自加深一般蕭條景象。殊不知人們正感蕭條壓力太重之時，正是景氣將復甦之時，一旦復甦開始，人們又措手不及，失去多少獲利機會。是皆業者不多注意一般景氣循環，更不知本身產品或具有循環現象，或有循環領先指標可用。徒憑一些直覺觀念、社會傳統，造成多少營業的損失，減少可獲的利潤。在投資方面更屬如此，繁榮時看見有利可圖，極力下注；蕭條時，意願消沉，不肯開始創造事業，不少企業因此受害。各大公司行號的經營情況，我們難得詳細資訊，不能舉例實證。但我有一女婿在前數年（民國六十七年）景氣繁榮之時，會同多少位朋友引進西德技術與辦一皮革廠，因為當時皮革生意很差不差，經兩年餘不斷投資，我也幫助他，也參加二十萬元新台幣，當時我還未研究到景氣循環與事業發展的關係，他們一直盼望能開

工生產，我也一直盼他成功，但他們財力有限，到有出品時，景氣衰落了，產品無銷路，他們再無力增資，讓存貨不斷增加，只好將廠連存貨賣給他人（那一位因經營不善也失敗了），大家賠掉了幾千萬，我的養老餘款也賠掉了，雖處之泰然，女兒不忍見爸爸受累，最近兩年將薪水所得的餘款每年代償五萬元，好像女婿不知道此事，我們夫婦不要她代償，她却非償付不可。這是一個家庭的平凡故事，也是一個慘痛的失敗經驗，惟因不懂景氣循環致有如此大的影響。大約半年前，我以景氣循環對營業決策的關係，與薛教授維忠（現任中央銀行祕書處長）談及，他說不錯，中鋼與中船兩大公司的營業順利與挫折，可為良好佐證，前者在景氣衰落時期（六十三年九月開工）開始建廠，到景氣繁榮時期（六十六年十二月）竣工，竣工後產品銷路漸旺，生意漸興隆，中鋼不但為我重工業發展之基礎，亦為我資本技術密集工業建立之楷模。然而中船於六十一年研議建廠，正值航業、造船業一片好景，國內外船東爭取船席，但在施工期間，適逢能源危機發生，物價飛漲，材料缺乏，資本不足，遭遇困難，增加造廠成本，迨六十五年六月建廠完成，正值衰落時期，船東極力設法解除造船合約，遭遇不少業務上的困難，至今中船公司仍脫不了財務的過重負擔，成了國營事業中業績較差的一份子。由是可見景氣循環的總體與個體研究，殊為企業經營之鑰，而景氣預測之實用價值，實不容忽視。

景氣循環的總體經研計劃

景氣循環的研究與景氣預測的積極推行，在總體經濟方面更重要，然而我們似乎還做得績效不彰，台灣在這方面的表現除王師復先生在台大經濟系開過經濟循環課程外，另有于宗先及邱依忠兩先生各寫出一本經濟預測方法，自有助於青年們的研究，于先生每年寫兩次經濟預測的文章，發表於中研院經研所的期刊「經濟預測」。景氣變化萬端，一年兩次的觀察自嫌不夠，這種報導也就漸漸減少注意的人了。邱先生忙於為經建會做長期計畫，也就沒有專研景氣預測了。經建會經研處有一特別小組，專辦景氣預測。這個工作最先是本人建議興辦的，當然希望委託文大經研所辦理，他們兩位副主委中郭婉容教授知道我一向研究這個問題，與其秘書長商量，主張交由我主辦。不料另一位有力人士則主張交由另一大學經濟系（所）辦，其理由是張教授無幫手，這位有力人士以同樣理由還否決了我另一研究案，還不知他以這個理由壞了我多少事？但許多人說，另外某一大學誰是這個問題的專家呢？於是議論紛紛，最後決定他們自己成立小組專辦此事，經過相當時間的考察研究，然後有他們的「台灣景氣指標」產生，其中包括：1「台灣景氣對策信號」（仿日本與西德的做法）；2「台灣景氣動向指標」（仿美國NERB的做法）；3「台灣廠商經營調查」（一部份仿西德IFO經濟研究所的做法）。他們每月以交通號誌（紅綠藍燈等）發表景氣情況，並自廠商調查產生若干有用統計資訊，例如：製造業設備利用率及利潤率等，暨製造業內各業別的設備利用率，新接定單趨勢、利

益率等。又如貿易業主要項目的利潤率，使作經濟分析的人得到不少方便，所以這個預測工作誠有相當貢獻。但他們三種指標所指示的景氣演進階段，每不能完全一致，例如：七十一年二月的景氣對策信號低沉於藍燈以下，景氣同時指標亦向下，而廠商調查在總製造業方面則景氣向上，同時其領先指標自一月至二月係向上盤。綜而言之，四種指標，兩種向下，兩種向上，則不知究竟還在景氣谷底盤旋？還是已經開始復甦？他們並未作進一步深入之綜合判斷，使讀者無所適從辨別，請原諒我直說，這是他們應改進的地方，不知經建會的朋友以為然否？

景氣預測的功用，還是在政府政策措施的決策方面。近年來，默察我政府財政與金融措施，都注重他們認定重要的有關資訊，而鮮注意於景氣循環所屬階段的關係，有時符合景氣所要求的政策條件，政策功效很好，例如十大建設。有時則反其道而行之，政策不但無效果，或者反受其害。有感於此，甚覺反循環研究措施及其適應景氣發展階段的重要。慕尼黑IFO經濟研究所常務理事

Dr. W. Strigel曾應經濟部張部長光世之邀來台，他曾告訴張部長：台灣經濟發展已漸爬高，便漸見不易，必須深切了解景氣情況，作適當的措施，方有助益，若措施與景氣情勢不相符合，則大受損害。今天與經濟發展初期情況不同，政策偶有不當，會有很大影響。他論及台灣此種預測工作之時，也提華岡經研所的活動。張部長旋奉命調職，經濟部長一職由趙耀東先生繼任，他給趙部長信也談到此事（我有他信的副本）。國

外友人關懷我們的進步，我們能不受激勵，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力上加力？於是我寫了三封信，各附一個研究計畫。致徐部長立德的計畫書為「景氣循環與財政政策」；致中央銀行俞總裁國華的計畫書為「景氣循環與金融政策」；致經濟部趙部長耀東的計畫書為「景氣循環與景氣政策」。三個計畫有相同之處，但研究結果的報告應不盡同。有人問我：「你與他們都不相識，或相識亦素無往來，今冒然提出研究計畫，豈能有什麼肯定回音？」但我之為此，並未考慮有無肯定回音，只盼能引起他們注意，將於制定政策時，或會發動研究，而那三個問題，我仍將帶領研究生以畢業論文方式研究，只不過發展要慢得多就是。何況他們三位的肯定回音，未必完全無希望，我為推進學術而熱心，自不以宣揚學術為恥。幾年前我向「經設會」（從前的稱呼）申請景氣預測的研究，對我雖無反響，然而激起他們自己與辦，致有今日的「台灣景氣指標」，成功不必在我。對我而言，仍算是「福音」傳出去了。

盼國科會推動研究工作

十年以來，本人推進這種研究工作，費盡不少心力，並非專為學術興趣，亦因它的預測如能較近理想，合乎實用，殊與經濟穩定成長有所助益。此種研究工作，在進步國家無不有政府的協助，德國有所謂共同研究社專門協助教授們研究，美國不但有政府協助，並有多少基金會，援助這些研究工作，其他姑不具論。我國自先總統蔣公提倡「研究發展」以來，多少機關編列有預

算，並設有專門機關：國家科學委員會，對推動科學技術負有專責，又有經設會（今稱經建會）掌理中美相對基金，亦可助經濟科學研究，然而曾提出景氣預測計劃，如前所述，被人破壞了。我也向經建會另提有一更重要的研究案，亦被同一人以同一理由破壞了（為免讀者笑我小氣，不擬評述）。經建會中不少認識我而為相知頗深的朋友，但我再不想向他們求援，這個財源早已斷絕了。國科會負有推動科學研究之責，我在台大開始，連年有專題研究，每年的報告，均變成一本書（1.國民預算—度支政策的運用；2.經濟預測之研究；3.經濟預測三種數量方法的特殊問題與其關聯；4.質與量兩種調查方法之異同），迄轉入台大後，仍繼續此項工作，但國科會前數年訂有一限制，就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不得參與此種專題研究，我於是擱筆不彈此調了。於是開始想作集體研究，向該會提出經濟預測的研究方案，適有機會遇見徐賢修主任委員談及此事，他說，這個研究方案很好，只可惜「經設會」已有此種工作，國家財力有限，不必做重複的事情，不過你還可以向本會副主委張明哲先生請教，看是否還有辦法，於是轉而請教張明哲先生。他說，不是重複的關係，是受法令的限制，私立大學不能申請，於是多年不做此想，但國科會修改辦法，開了私立大學申請之門，直至去年春聽說已解除了。有一次遇見人文社會科學組華嚴主任，問及我們可否申請。她說，若你是主持人，我們可以同意。於是於民國七十年四月以「整合景氣診斷法的實證探討」為題，申請成立。而中國文化大學

於七月間方奉到修改的「國科會組織條例」，而該條例係總統於六十一年公布的，我們真是見聞不週，誤了八年的研究輔導機會。新任國科會主任委員張明哲先生，曾於七十年九月在立法院答覆立委之質詢，謂「人文社會科學專科研究甚少，七十年只有卅二件，自然科學則有七百餘件，他於是感到社會科學人才難求，故表示今後首要工作在於積極培育人文科學人才，以改善目前種種缺點。」但另外監察院也因台大教授有以譯作代自著一案，引起各委員對該會審查辦法之存疑，決定由該院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此案久無下文，不知是否該會因故擱置未辦？或調查尚無結果？我們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對此一問題，非常關注。誠如陳翰珍委員所說：「現行之審查研究係採祕而不宣之方式，污垢易於暗中滋長」，張主任委員當係虔誠要培育社會科學人才，則其着手之方法，在建立一套公平審查制度，並選用辦事持

編輯報告 編者

△名作家郭功雋先生摘譯之「賽珍珠自傳」從本期起隆重推出連載，賽珍珠曾先後榮獲世界最負聲望的兩枚大獎：諾貝爾文學獎和普立茲獎，她在南京歷任東南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英文教員。「賽珍珠自傳」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部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介的長篇著作。

△莊政教授的「也談宋慶齡」早於七十年七月送到本誌，當時因稿擠乃商請「時代文摘」刊登於

公正態度的重要主管人員，一切公開處理，如是可逐漸培養成公平公正公開之輔導科學人才風氣，不出數年就會有人才輩出，無庸長此作無「人才」之感嘆。

寫到此地，偶有朋友來，問何以談及若干牽涉人事的故事？我說，我非牢騷，並無發洩之意，亦非為自己還要研究着想，乃欲舉事實，以見不但做官做事有大攔阻，研究學問亦然。我在研究統計道路上遇見「不可見的一隻手」，專計阻礙我，只怕我研究有成，近年在研究景氣預測上則遇見一隻「可見的手」，阻礙了我多年的研究工作，原因何在？我好像不知道，或者是不欲明言，免太妨礙「他們」的名譽。我今已八十有三歲了，還能作多少的研究？今隱忍含蓄吐出心聲，冀賢明當局深切體念，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審查制度與培育人才方法，則誠未來研究人士之幸，國家之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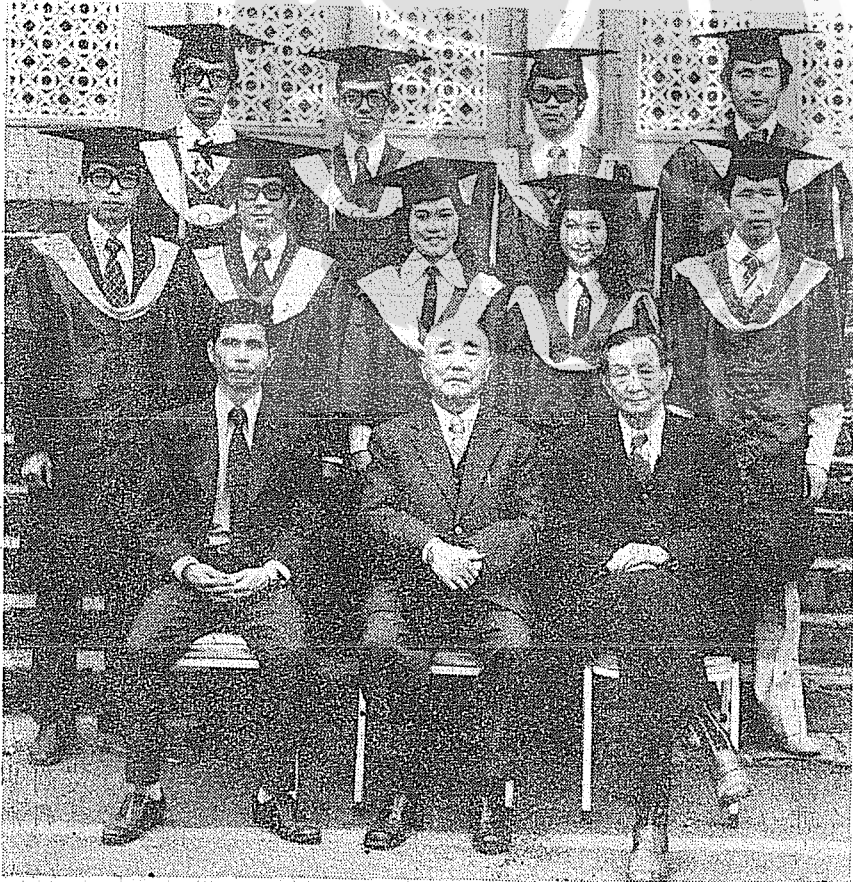
七十年九月號（十四期），「時代文摘」已無存書，本誌應讀者之囑，特在本期刊出，並附照片多張，敬請讀者鑒閱，並向時代文摘社致謝。

△江鴻教授、皮宗敬教授、王道平先生、謝樹楠先生、馬驪珠女士、劉本欽將軍、蔡秋來博士、陳敦正先生等的大作，將自下期起隆重推出，敬請讀者期待。本誌一八六期八月號許世瑛博士「紀念父親」一文係為紀念其尊翁許壽裳老人而作，許博士本傳統孝道，子不言父名，因此全文都未曾寫出壽裳老人的大名，承讀者先生電話詢問，特為奉告，並向熱心讀者致謝。

(頁十二見文)圖插「究研氣景濟經」為果張



張果為教授(右排)與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師生合影。



張果為教授(右排)與中國文化大學經濟研究所畢業生合影。